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9
(第8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8)

农户分工模式:从传统到现代

黄振华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从分工的视角看,当今农户与传统农户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前者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相适应,具有亲缘性、内敛性和单一性特征,形成闭合型的分工模式;后者则以商品化、市场化为契机,其分工模式逐渐向货币化、外向化和专业化转换,表现为开放型的分工模式。基于分工的视角,当今农户已经摆脱了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束缚,并逐渐融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化分工体系当中。

关键词:传统农户;社会化农户;闭合型分工模式;开放型分工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9)01-0119-06

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1]301。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即提到了分工与生产发展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的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2]5。因此,就农户分工模式而言,其不仅是农户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确定农户性质和特征的重要指标,更可反映农村社会经济的变迁和发展。

从分工的视角看,当今农户与传统农户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农户分工以"家庭—家族"、"村庄—集市"、"农业—手工业"为核心,形成向内收缩的闭合型分工模式。在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户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封闭而隔离,农户社会化程度普遍较低,其参与社会分工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均不充分。随着商品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当今农户在分工逻辑、分工空间、分工纵深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发展,实现了对传统农户闭合型分工模式的"突破"。比较而言,当今农户已经摆脱了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并逐渐融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化分工体系当中,形塑成为开放型的社会化农户分工形态。

一、传统农户:闭合型的分工模式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基于家庭经营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长期以来,以"家"为本位的生产经营方式始终难以摆脱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束缚,"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3]。在此背景下,传统农户的分工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家庭经营方式的局限,并表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农户参与分工以"家庭—家族"为核心,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是产生和维系分工的社会纽带,分工模式表现为典型的亲缘性;其次,传统农户的分工地域固定而且狭窄,通常以其基本生产、生活区域为限,集中于"村庄—集市"的辐射范围内,形成"核心—边缘"式的地域分工格局,内敛性特征显著;再者,从分工领域来看,传统农户分工局限于"农业—手工业"的二元分工层面,分工专业化和层级化明显不足,呈

收稿日期:2008-11-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6JDXM096);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07JA790009)

作者简介:黄振华(1984—),男,江西兴国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

现单一性特征。总体而言,由于传统分工模式的亲缘性、内敛性和单一性,农户被束缚于一个近乎闭合型的分工环境当中,大大限制了农户参与外部社会分工的动力和机会。

"家庭—家族":亲缘性的分工纽带。"家"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和根基。对此,费正清曾经有过精辟的概括,在他看来,"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部分"[4]。费孝通也认为,"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5],"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农民社区的家庭是必需的和最低的社会合作的自足单位"[6]。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户生产的劳动力配置大都以家庭成员为主,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以家庭作为决策中心,劳动分工和协作也大都集中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就农户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言,"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7]。在"马铃薯"式的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户与外界缺乏沟通与互动,分工与协作行为自然无法从外部获得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传统农户分工只能以家庭为载体,亲缘关系成为乡土社会中农户分工模式最为重要的联系纽带。

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是农户分工行为的主要承载者,但并不是全部。亲缘性不仅产生于血亲性质的家庭,而且还会体现在宗亲性质的家族上。实际上,"在参与全体村民相关的村务(公共事务)中,为人所承认的最基本的参与单位是同一宗族组成的门或派,由于其成员是同一祖先的后代,故具有血缘集团的性质。""……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8]。因此,当涉及一些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时,劳动力的配置可能超出单纯的家庭范畴,并形成彼此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必须强调的是,由此产生的分工行为仍然没有超越亲缘关系的范畴。事实上,如果没有"同宗同祖"的"血缘集体"性质,诸如此类的分工与协作也无法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开展。

可见,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家族"是农户分工的主要承载者,亲缘性是农户分工的逻辑纽带。以亲缘关系为基础,传统农户分工主要以家庭内部分工为主,缺乏向外部延伸的动能。需要指出的是,农户分工模式的亲缘性特征也从另一个方面突出了传统农户的封闭和隔离,因为除了亲缘关系以外,传统农户几乎无法找到参与社会分工的其它稳定而持续的载体。

"村庄—集市":内敛性的分工地域。农户参与分工的地域分布以流动性为前提。在传统农业社会,"延绵不断的外婚制和从夫居规范有效地塑造了中国的农村社区,并创造了同族男性和通常嫁进或准备嫁出去的妇女构成的地域群集"[9]。在同族聚居习俗和传统宗法思想作用下,传统农户不愿意脱离现有的"熟人社会",而是恪守"本份",过着"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与此同时,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乡土社会中,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和不可分性,也进一步阻碍了他们的社会流动。事实上,"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0]7。对于他们而言,只要不是遇到巨大的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等特殊事件的影响,农民是极少背井离乡的。

在缺乏流动的乡土社会中,传统农户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均局限于"熟人社会"当中,固定而且狭窄。在流动性明显不足的条件下,传统农户的地域分工受到极大的空间限制,难以突破狭小的村庄空间而向外部拓展。事实上,由于农户分工行为的亲缘性特征,其地域分布必然以"家庭—家族"的基础,"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亲缘的投影"[10]70。

不难理解的是,在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生产背景下,村庄自然成为农户参与分工的核心区域。而一旦远离农户熟知的生产、生活环境,传统农户的外部联系便逐渐减弱,农户参与分工的难度大为增加,其开展分工与协作的可能性随之减少。因此,从传统农户分工的分布梯度上来看,传统农户形成以居住地即村庄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型的地域分工格局。在这样一个同

心圆性质的分工圈层中，牢固的亲缘关系和匮乏的外部联系共同制约了传统农户的分工空间，其分工地域被禁锢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结构当中，形成内敛性的分工模式。

除村庄之外，集市是农户参与分工的另一重要地域。尽管传统农户的自给性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但难以避免的交换需求还是催生了农村集市的产生。在集市上，村民们互通有无、彼此协作，无形中构成了农户参与社会分工的空间集合。尽管市场的狭小和周期性都暗示了乡村集市的从属性质，但农户通过集市参与社会分工的事实不应忽视。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市场联系依然不能摆脱血缘和地缘的影响，因为这些乡村集市也常常成为“相邻的地方化宗族之间强化联系并成为统一体的联系纽带”，“基层市场可以看作是‘复合宗族’的所在地可能更好些”[11]。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本身也是具有血缘性或者宗族性的。

总体上看，受到亲缘关系的影响，传统农户的社会分工行为被限定在以“村庄—集市”为核心的空间范围中，并在分工梯度上呈现为“中心—边缘”式的内敛性的地域分工格局。

“农业—手工业”：单一性的分工纵深。在传统农户社会中，土地是农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农业是农民最基础的生产领域。长期以来，传统农户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其分工与协作行为也主要集中在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对此，杨懋春在对山东台头的人类学著作中，就曾有过对农户劳动分工的生动描述：田间、打谷场、菜园里和家里的劳动根据经验和体力来分配。……这种分工不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家人到达田里后，每个人干适合自己的活，父母不会发号施令。这种分工也有一定的灵活性。……这种分工也依赖相互间的协作。[12]

在此，家庭分工几乎完全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展开，相互之间的分工没有标准，而完全依靠家庭的内部结构而决定。这种分工，是一种“自然”分工，也是一种缺乏专业化的分工，而这又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本身相契合，并使得二者相互协调，得以共生。

在参与分工的职业取向上，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农业生产外，家庭手工业（或者称之为副业）也是农户分工与协作的重要载体。事实上，在传统小农社会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对此，黄宗智认为，家庭手工业是农户生产的“另一根拐杖”，“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成为补充种植业收入不足、养家糊口和维持再生产的主要手段。两者的结合是那里的农户生存和再生产的关键。”[13]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传统农户始终无法摆脱封闭与隔离的单一性分工格局。在分工广度上，传统农户分工的产业趋向主要集中以“农业—手工业”领域内，除此以外，别无其它更多的选择。从分工的深度上看，由于农业与手工业均对技术要求不高，农户的分工专业化程度显著低下，具体表现为农户分工模式的“自然性”特征，从而无法延伸分工链。正如杨懋春所言，传统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分工行为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费孝通也曾指出：“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10]3。

二、社会化农户：开放型的分工模式

与传统农户相比，当今农户在家庭经营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农户的分工模式也在这一“大变局”中发生着结构性的变迁。正如徐勇所言，“如果从历史变迁过程的角度考察，我们会发现，当今的农户已不再是局限于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而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农户经济形态渐行渐远”[14]

市场的渗透：“货币伦理”。“农户与市场的关系是确定农户性质的主要标准，也是认识农户的

重要视角"[15]。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户的生产经营具有自给自足的特征,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很低。无论是从市场范围、交易方式、交易周期和活跃程度等方面来看,市场在传统农户生产经营中始终居于从属地位。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户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并表现为显著的货币化特征。在传统农业社会,货币的作用并不突出,传统农户不需要或者只需要极少的货币就能够保障家庭经营的正常运转。而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深入,当今农户已经被卷入到一个市场化的社会体系当中,农户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货币支出需求日益增加,从而"打破了家庭的自给性供给边界,农户面临短期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家庭赤字"[16]。在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下,通过市场行为获取货币收入普遍成为当今农户生产经营的关键性目标。

以农户生产经营的货币化为前提,当今农户分工行为也逐渐由家庭内部分工走向社会分工,市场性分工逐渐代替亲缘性分工。对于分工行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亚当·斯密很早就进行过系统性的论述,在他看来:"市场是协调分工的基本形式之一,而且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只有通过拓展市场大小,分工的全部利益才能够实现,市场范围的扩大有助于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2]5在追求货币收入的经济动机驱使下,当今农户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与互动不断深化,社会联系日益紧密,农户参与分工的动力和机会也不断增加。可以推断的是,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户参与社会分工的程度必然将进一步提升,农户也将逐渐融入到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分工体系当中。

由此可见,分工逻辑的转换是当今农户区别于传统农户的重要特征,也是农户性质变迁的标志。在传统农户阶段,农户分工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亲缘关系是农户参与家庭分工的逻辑纽带。而在社会化农户阶段,随着市场的不断渗透,农户遵循"货币伦理",经济动机驱使农户大范围的参与社会分工,分工模式趋向于开放。

城乡的流动:空间拓展。内敛性的传统农户分工具有两层涵义:一是农户分工受亲缘和地缘影响,空间狭窄,二是农户分工地域具有固定化特征,极少变化。与传统农户相比,当今农户分工的地域限制已经大大减弱,农户的流动速度和流动频率也大为增加。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异地流动现象非常突出。从其变化过程看,农户流动逐渐从"离土不离乡"向"离土又离乡"发展,从本地流动向异地流动转变。在农户加速流动的过程中,农户参与外部分工的机会越来越多,其分工地域也逐渐从乡村向城市发展。再从农户的流动频率上分析,由于外部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户分工的地域不再固定化,而是经常变动。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今农户的分工不仅扩大化了而且日益流动化了。

农户分工的空间扩展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有其必然的生成机制,是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在于,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性分工逐渐取代亲缘性分工,当今农户的分工行为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货币收入偏好。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农户倾向于向外寻找就业机会。在货币化动机推动下,当今农户逐渐纳入到市场体系当中,市场机制主导着农户的分工行为。也正是在受到"逐利"心里的影响,农户分工的空间集合不再固定在本地,而是不断变化和流动,事实上,当今农户往往根据薪酬、待遇择地择时而动。促成农户分工地域外向化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当今农户分工机会的非均衡特征。一方面,农村人地矛盾突出,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在这一背景下,本地分工机会几乎饱和,农户参与本地分工的机会渺茫,向外地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外溢"的"推力"作用明显。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达地区对农村劳动力需求强劲和较高的薪酬水平对农户形成巨大的"拉力"作用。一"推"一"拉"之间,农户分工的地域重心自然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转移。

职业的转换：行业延伸。随着农户外出务工现象的增多，当今农户参与社会分工的行业逐渐增加，已经不同于传统农户阶段仅限于农业和手工业等行业。当下，不少农民已经参与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化分工体系当中，需要掌握的专业技能逐渐增多，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展和农户分工空间的进一步扩张，当今农户的分工行业更加多元。

从职业类别看，当今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选择很多。除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外，越来越多的农民也通过技术培训等多种渠道进入较高的分工层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不少农民工的创业成功，城市中已经出现了白领农民工这一新的群体。就职业的稳定性而言，传统农户基本只有农业和手工业两种选择，转换的可能性极小，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当今农户分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农民选择职业的范围扩展了，农民的职业转换更为频繁，流动性大为增加。对于当下在外打工的农民来说，很少有人一直从事同一职业。此外，许多农户不仅经常更换职业，而且频繁更换打工地点。对他们来说，货币收入成为其选择职业的动力。而对于他们而言，由于主要以劳动力投入为主，没有其它成本投入，其转换的成本是很小的，因而其频率自然极高。伴随农村青壮年的大量外部就业，传统农业生产的分工格局也显示出新的变化，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农业生产的老年化和女性化特征，以及家庭手工业的日渐没落。

总之，在市场化、外向化、社会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农户的职业选择和职业转换都大大加快了，其参与外部分工的频率和程度也日益深化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仍然在本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农业—手工业”分工逻辑，而是利用农闲时间寻找其它工作机会，“打短工”、“打临工”成为他们的日常选择。

三、总结性的话语

随着农户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当今农户的分工模式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并呈现出新的性质和特点。从分工逻辑来看，当今农户分工已经由亲缘性分工转化为市场化分工，货币压力日益成为农户参与分工与协作的内在动力。从分工的空间维度着眼，当今农户在强烈的货币化动机驱使下，已经不再局限于“村庄—集市”型的本地分工活动，而是出现了分工的外向化趋势，农户分工的地域也不再固定化，而是处于不断流动的过程之中。在分工的产业分布和专业化水平方面，当今农户正逐渐摆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而是向更多的行业和职业渗透，分工的专业化、多样化、技能化日益加深，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格局日益成型。

无论是分工的逻辑纽带、地域分布还是产业纵深，当今农户都大大区别与传统农户。在农户分工的演进过程中，分工逻辑是核心也是关键。正是由于农户分工的逻辑纽带从“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亲缘性分工到以“市场—货币”为核心的市场性分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户的分工格局，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农户在分工地域以及分工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变迁。因此，市场是农户分工演进的核心动力，货币是农户分工演进的内在动因。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不难判断，未来市场机制对农户的分工行为将进一步产生巨大的影响，农户的分工模式也将进一步的市场化和货币化。从当前农户分工模式的转变来看，当今农户已经越来越深入到这个由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分工体系当中，并日益成为社会化分工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看，农户分工模式的演进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在各种外部社会约束条件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透过农户分工模式的差异化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发现和厘清农户性质以及农村社会变迁的历程。应该看到，当前农村正处于社会化变迁的历史进程当中，农户的生产、生活与社会交往都在越来越深入地与外部世界进行着互动。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传统社会中的血亲、习惯逐渐淡化，更具包容性和渗透性的经济联系、市场供需居于越来越主要的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农户也走出农家,迈向社会,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跃迁。

*致谢:本文的观点得益于徐勇教授对"社会化小农"概念的阐述,邓大才教授对文章的部分观点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致以谢意。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1.
[2]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5.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87.
[4] 费正清. 美国和中国[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21.
[5]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1.
[6] 费孝通. 中国绅士[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3.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第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77.
[8]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65.
[9] 朱爱岚. 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39.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6.
[12] 杨懋春.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75.
[13]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农户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2000:307.
[14] 徐 勇. "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农户的建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
[15] 卢昌军,邓大才. 从"以业为商"到"以农为市"[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18.
[16] 邓大才. 社会化农户:动机与行为[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13.

The Labor-Division Model of Rural Households: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HUANG Zhen-Hua
(*Center for Chinese Rural Studies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divis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oday's rural households and traditional rural households. Today's rural households adapt to village society, with relatives, reserved and uniformity characteristics of a closed-type labor-division model, while the traditional rural households turn to currency, export-oriented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n opening labor-division model.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division, today's rural households have go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small-scale production constraints and gradually into an opening and flowing social division system.

Key Words: Today's rural households; Socialized rural households; Closed-type labor-division model; Opening labor-division model